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政治价值与实践意义*

孙德海

【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针对西方以选举为核心要义的所谓自由民主在当今世界愈演愈烈的“民主乱象”“民主冲突”“民主危机”等人类政治发展困境，在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面全面总结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明确做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加深了民主的内涵”等一系列科学论断，不仅系统诠释了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多重政治价值与重要实践意义，而且深刻阐明了人类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在当今世界民主话语权“西强东弱”的时代背景下，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澄清和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在民主政治建设上的一些错误认识，在新时代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关键词】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西式自由民主 民主政治

作者简介：孙德海（1968-），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副教授，聊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山东聊城 25200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不仅深刻揭示了我国人民民主的本质与真谛，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学说。在当今世界民主话语权“西强东弱”的时代背景下，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系列科学论断的丰富内涵和思想精髓，对于我们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特色、传播好中国声音，并掌握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权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丰富了民主的实现形式

民主作为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自人类产生共同体以来，就一直是世人崇尚的价值目标，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被人们广为追寻和探求。特别是自古希腊人于公元前5世纪发明“民主”一词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不断探索和实践，人们先后创造了共识性民主、选举式民主、参与式民主、代议制民主、大众民主、精英民主等丰富多样、各具特色的民主实现形式，但都无一例外地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和规范与经验之间的张力。可见，民主虽然是个“好东西”，并且人人向往之，但由于人类社会政治生活本身的历史性与复杂性，也决定了实现美好民主政治制度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然而，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视人类社会民主政治历史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体系建构研究”（16JD710028）、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理路与制度创新研究”（14BZZJ01）的阶段性成果。

性、具体性和多元性的事实，从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出发，处心积虑地宣称其奉行的以选举为主要特征的所谓自由民主模式具有全球普世性和历史永恒性，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后盾、军事霸权和文化实力，以宗教传教士式的狂热，竭力向全世界推销。这不仅主导了西方国家的民主实践和政治发展，并且为了迎合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还赋予其衡量不同社会制度优劣试金石的功能，使其作为划分民主与非民主国家的普世标准，于是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政治上的所谓正当性与合法性，从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在国内的政治改革中盲目移植和效仿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从而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但事与愿违，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于1991年出版《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后的20多年间，西式自由民主不仅没有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带来安居乐业，反而带来的是至今都难以扶平的内忧外患，有的甚至造成亡党亡国的恶果。对此，习近平深刻地指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①

实际上，最近几十年来，西式自由民主不只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引发种种“民主乱象”，即便是在其发源地的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断暴露出日益严重的“民主危机”。君不见，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直以推行自由民主为楷模的美国等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国内也大都陷入社会矛盾激化、政府效率低下、国家治理无效等政治发展的怪圈。正如德国历史学家米夏埃尔·施蒂默尔在反思西式自由民主弊端时描述的那样：“持反对意见的人阻挠乃至勒索，无法管理，国家债台高筑，政党分崩离析，政府分崩离析，国家分崩离析的可能性也不再能排除。”^②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当今西式所谓自由民主在全球遭遇的尴尬窘境不仅背离了亨廷顿等人的良好愿景，而且也迫使“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发出了“为何民主表现得如此差劲”的诘问，更让西方的许多民主人士陷入“西方民主病在哪儿？”的迷思。

在西方学术界不断反思其自由民主种种弊病的同时，进入21世纪后，西方政治界也开启了对其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反思。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于2014年12月4日曾在《纽约时报》发表《民主已死？真正的民主仅仅给民众投票权是不够的》一文，他指出：“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出现了障碍：美国国会、英国联合政府，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都遭遇了困境，难以做出必要的决策以回归经济增长……民主制度显得迟缓、官僚而又脆弱。”并以“民主国家对不起自己的公民”表达了对其所谓自由民主的哀怨与不满。无独有偶，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于2015年在一次做客访谈节目时也声称“美国民主已死”，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美国“寡头政治”“金钱政治”的失望，并历数美国政坛现存的种种弊端，如“党派分歧严重”“府院之争激烈”等^③。

鉴于西式自由民主在当今世界引发的种种“民主乱象”，习近平在深刻认识人类社会民主发展历史逻辑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④“‘名非天造，必从其实。’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⑤也就是说，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世界上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民主模式，民主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具体的政治实践活动，其在世界各国的实

①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② [德]米夏埃尔·施蒂默尔：《西方就这样成为过时货》，《参考消息》2013年10月8日。

③ 参见《美国前总统卡特：美民主已死 没两三亿选不了总统》，http://intl.ce.cn/qjss/201509/25/t20150925_6576265.shtml。

④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⑤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现形式和发展程度不仅有其历史逻辑，而且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每个国家发展民主都不能脱离其既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更不能定于一尊，而历史性、具体性和多样性是人类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只有深深植根于本国土壤、真正建立在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的民主制度，才最有效、也最管用。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民主的做法不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坚持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自觉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出发，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立足点与出发点，主动适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需要，探索和创立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反映人民意愿的协商民主这一新型民主形式，并使其与选举民主有机结合、优势互补，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全面总结当今世界各国在发展民主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程，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实现的伟大创造，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①

在深刻揭示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渊源和历史逻辑，系统阐明其鲜明特色与本质属性的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仅“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②，而且“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丰富了民主的形式”^③，“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④。

二、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拓展了民主的参与渠道

众所周知，自古希腊人于公元前5世纪创造了在城邦内部以全体公民通过共同讨论决定公共事务的民主形式以来，这种以公民直接参与政治过程和公共决策为标志的民主政体就一直深受人们的尊崇，由此，“人民的统治”或“人民的权力”便成为民主的原生内涵。特别是“民主”一词在近代被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赋予“人民主权”的桂冠后，使其在世界范围内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锐利思想利器，并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步确立，为了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业已建立的政治统治，一些西方思想家打着防止和避免由于公众直接参与而导致所谓多数人暴政的旗号，开始不断对“民主”的概念进行改造，从而使民主的内涵逐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美国学者约瑟夫·熊彼特于20世纪40年代从精英主义立场出发，提出了“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⑤。在熊彼特的精心包装下，再加上此后罗伯特·达尔、乔万尼·萨托利等一批西方民主理论家的进一步论证和发展，以选举为核心要义的西式自由民主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范式，并被供奉为民主的经典模式。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② 习近平：《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8日。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页。

⑤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5-396页。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特别是随着人口众多和疆域辽阔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不断出现，由于受到民主运行技术和成本的制约与限制，人民主权和人民当家作主并不是简单地指人人都直接掌握国家权力，由于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政治发展过程的日益专业化，人民主权的实现有其自身规律和实践逻辑，那就是为保证国家权力和社会秩序的高效有序运行，一方面需要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政治精英按照人民的授权来治理国家和管理公共事务；另一方面，作为人民代理人的政治精英和集团在治理国家与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也不能排斥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而应经常地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从而确保权力按照人民的意志正确运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分离问题。

但由于西式选举民主从其产生之日起，只是把民主视为人民通过投票选举政治精英的一种程序和方法。而在选举之后，却以社会公众掌握和拥有的知识、技能、信息等有限为由，想方设法地限制甚至排斥社会公众对公共决策和政治过程的直接参与。对于这种民主形式的欺骗性，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阶级并建立民主共和国后，“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①。至于其宣扬的所谓“一人一票”的普选权，只不过是愚弄人民的神话和工具而已。可见，西式选举民主从其产生之初，就遮蔽与内嵌着与生俱来的缺陷与不足，并非人们想象的“自由之花”，也不像一些人鼓吹的那么美好与令人向往。

为进一步克服和揭露资本主义选举民主的片面性与虚伪性，列宁也指出：“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②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人民的平等权利呢？列宁认为，一方面，“群众应当有权为自己选举负责的领导者。群众应当有权撤换他们。群众应当有权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细节”^③；另一方面，民主“不仅仅需要民主形式的代表机构，而且需要建立由群众自己从下面来全面管理国家的制度，让群众有效地参加各方面的生活，让群众在管理国家中起积极的作用”^④。可见，在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中，建立严格的授权程序，确保政权的正当性十分重要；但规范权力的运行过程，确保民主的真实性同样不可或缺。否则，民主不仅是不完善的、不健全的，而且可能是畸形的、虚假的。

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民主观为指导，我们党在发展民主的过程中，始终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与核心，在大力支持人民群众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民主权利的同时，为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还不断创造了人民内部在各种重大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进行充分协商的民主形式，并使二者在实践中有机融合、相互贯通，从而极大地拓展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渠道，有效避免了人民在选举后权利被搁置于“真空”地带的尴尬处境，真正实现了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等多元主体之间在政治生活中的良性互动和公共事务中的协同治理。在深入总结我国发展人民民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强调指出：“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了民主和集中的统一；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中国，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1页。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3-144页。

④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7页。

益彰的，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①

新中国近70年的实践也证明，与西方选举民主只强调简单多数决定原则而实现利益聚合的机制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实现人民民主长期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不仅尊重多数人的意愿，而且重视少数人的诉求，社会主义民主协商的过程主要通过个体不同利益的聚同化异与政治偏好的相互转换，从而实现在理性共识基础上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决策。

对此，习近平深刻地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通过多种形式的协商，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广泛接受批评和监督，可以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可以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可以广泛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可以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可以广泛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克服各项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无以落实的弊端。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所在。”^②

由此可见，与西式选举民主片面强调竞争性、对抗性和排他性显著不同的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通过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为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等政治主体搭建平等和理性的交流与对话平台，使各利益相关方在公共决策中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合理诉求，因而更注重协调性、包容性与和谐性，这样也就从制度机制上保证了人民群众能够持续、平等、真实地参与到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等各项公共事务中来，不仅彰显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而且拓展了民主治理的参与渠道，从而在日常社会政治生活中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过程性与真实性的有机统一，因而具有西式选举民主无法比拟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三、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加深了民主的本质内涵

在这个言必称民主的时代，民主俨然成为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的代名词，特别是在当今世界的民主化进程中，谁掌握了民主话语权，似乎谁就站在了全球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上。但鉴于当今世界愈演愈烈的“民主乱象”，我们不难发现，究竟何谓“民主”？“民主”意欲何为？却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时代命题。正如马克思所言：“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如果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能对付民主，否则我们就会失败。”^③

其实，早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过程中，就曾通过深刻阐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指出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并且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的自由产物”^④。列宁也认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正是在科学界定民主一般规定性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民主的本质内涵。马克思认为，“在民主制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⑤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1页。

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与它本身的意义不同的意义。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民主制独有的特点是：国家制度在这里毕竟只是人民的一个定在环节，政治制度本身并不构成国家……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①。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民主的本质内涵不是投票选举，而是人民主权，其实质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即人民自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也就是说，真正的民主制度必须能够保证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能实际控制政治过程，从而切实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如前所述，只是从近代以来，随着人口众多和疆域辽阔的大型民族国家的不断出现，由于受民主政治运行技术和成本的制约与限制，为了实现国家权力的高效有序运转，人们才创设了以选举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形式。但无论从人类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漫长历史来看，还是从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现实来讲，选举民主也仅仅只是民主政体的一种实现形式，或者说国家形态的一种，而不可能代表人类社会复杂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和运行过程。

显然，无论是从人类社会民主政治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还是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角度来讲，民主绝不可能是一选了之。这是因为，“相较于选举，立法和政策实施过程更关乎百姓的切实利益，这个过程的‘参与——回应’才能真实地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从而更能反映程序的公正与否”^②。也就是说，为确保人民主权的真正实现，民主治理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完整封闭的锁链，它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相互衔接和环环相扣的过程。选举解决的只是授权的问题，仅仅是民主整体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同民主选举一样也都是与民主治理相辅相成、不可缺失的重要环节，并且在制约权力和维护公共利益方面更加有效和持久。因此，协商民主作为倡导公民在自由、平等、理性的基础上直接参与公共决策、社会治理和权力监督的一种机制和方式，更能彰显人民主权的逻辑内涵。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那样：“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③ 不言而喻，“选举”是实现人民主权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其绝不是人民主权的全部内容和本质属性，同“选举”一样，“讨论”“商议”“辩论”等形式也都是民主的内在要素和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更具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参与性和体验感。

正是在深刻认识人类社会民主发展一般规律和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实现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坚持从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出发，自觉继承天下为公、民本主义、求同存异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的统一战线，从而孕育、探索和创造了协商民主这一新型的民主形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民主实现形式上的生动实践结晶和伟大政治创造，是与新中国共生相伴的新型民主形态，并深深植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命血脉之中，它不仅建构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而且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重要政治资源。恰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发挥了各方面的积极作用；既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又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原则；既坚持了人民民主的原则，又贯彻了团结和谐的要求。所以说，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40页。

② 杨光斌：《从国际政治比较看“治理民主”的优势——基于一些国家的民主政治演变为政治冲突之思考》，《北京日报》2015年6月15日。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加深了民主的内涵。”^①

实践表明，我国的协商民主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为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和理性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平台，能够把全社会各方面的意愿和诉求规范有序地纳入民主和法治的轨道，具有主体的广泛性、过程的包容性和结果的有效性等显著特点和明显优势。正基于此，在全面总结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再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这是因为：“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这样做起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础，也才能凝聚起强大力量。”^② 这些重要论述不仅深刻揭示了我国人民民主的本质内涵，而且是对我国人民民主理论的重大发展。正是在科学认识我国人民民主本质与真谛的基础上，习近平充满自信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③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政治创造和独特制度优势，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和重大的实践意义，我们必须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作出的“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④的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 [2]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 [3]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 [4]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
- [5] 林尚立、赵宇峰：《中国协商民主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 [6] 李君如：《协商民主在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 [7] 辛向阳：《习近平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思想探析》，《前线》2018年第5期。

（编辑：张 桥）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5-36页。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页。